

湖南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张培刚教授的新著《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这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专著。

张培刚教授是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早在四十年代,就曾以其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而获得“威尔士奖”并被列入《哈佛经济丛书》。该书被公认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创性著作,为了表彰张教授历史性的理论贡献,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于1985年授于他国际知识分子杰出成就证书,经过四十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了《农业与工业化》中的观点是正确的。张教授本人在此基础上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又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宏伟目标。本书的出版既反映作者的思想发展,也反映了他把发展经济学又推进一个新阶段即第三阶段。在编著体例上,作者是在哈佛版的《农业与工业化》的章节上进行补充、扩大的方式,既保存原版的体例,又丰富了现实内容。正如张教授在《新版说明》中所指出的:“现在采取原版部分与扩大补充部分并存的办法,合为一书出版,目的是便于读者系统了解经济发展理论这门学科产生、发展的渊源和演变,也便于读者了解几十年来作者在这个课题方面不断探索,研究的心得”。因此,在阅读这本著作时,既可以得到发展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概括、从而得到理论的享受;同时,也可以把它作为发展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史去阅读,其中当然包括张教授本人在创建传统发展经济学与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全过程中的思想演变与理论发展。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张培刚教授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如果说在四十年代的《农业与工业化》中,张教授已经自发地运用了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去研究农业国家的工业化问题,并从而创建了发展经济学;那么,在四十多年以后,他就更自觉地更熟练地遵循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而把发展经济学推上一个更高的阶段。他在《分析方法再论》(第一章第五节)中,曾经这样写道:“无论是探讨本书的主题‘农业国工业化问题’,还是探讨任何其它方面的问题,我认为最根本的观点是唯物论(实事求是)的观点与辩证法(发展与演变)的观点。”并说:“马克思、恩格斯综合研究了前人的思想观点,创造性地系统地提出了‘辩证唯物主

发展经济学的里程碑

读张培刚教授新著《发展经济学通论》

彭明朗

义’,特别是首次提出了把它用于人类社会问题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根本观点,可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永远留芳的真理,是我们研究任何问题所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

关于方法论问题,张培刚教授在《通论》中除了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分析方法外,并提出了理论、历史、经验三结合的方法论,我认为这种三结合的方法论是接近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另一种表述。张教授在引用熊彼特的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用“经验”去替代统计或数学,是有其独到而又独特的眼光的,是对熊彼特方法论的一个发展或补充。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这种方法论是更具有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因为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都有一个统计不准,资料不全的问题,不可能全靠统计来决策一切,更不应该用数学推导去调控一切。

张教授在书中多次提到:本书是理论的探讨,同时也是经验和历史的研究。我试把三者概括起来,就是理论作指导、历史作基础、经验作依据。在书中,对历史的研究方法尤为重视。我想,这是因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一重大问题,不准确找到其落后或不发展的原因是难于“对症下药”的。这种重视历史研究的分析方法,早在四十多年前的哈佛版原著中,他就已经很注意了。说“当时我已把历史的方法提到很重要的地位,并已在自己的著述中试图使用之。”^①而当今天去建立与研究新发展经济学时,这种历史分析方法就尤为重要。张教授写道:“我认为要建立新型的发展经济学,首要地就必须从现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历史方面来进行分析研究,探寻阻碍经济发展的最终根源。”^②这种“最终根源”,用张教授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历史幽灵”。

在张教授的三结合的方法论中,用经验去替代统计或数学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因外,我想经验是在理论指导下从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其中包括用统计或数学方法的总结,这些经验包括当前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也包括西欧、日本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此外还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已取得成功的经验,例如亚洲“四小龙”的经验。这些经验复盖面很广,无疑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只要结合本国国情而有针对性,是行之有效的。

其次,就统计或数学本身的功能来说,对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来说,统计或数学无疑地、或多或少地,其功能会受到一定限制。因此,在经济学科中与其用数学或统计学中的“点”、“数”概念,倒不如用“区域”、“地带”、或“范围”概念更为有用、更能切合客观实际。张教授在《通论》的最末一页中指出:“经济学是一种‘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既然是一种人文科学,所以还不能如大多数‘纯粹’科学或‘自然’科学那样精确。……本书不仅是理论的分析,同时也是经验的和历史的研究。……概念中和分类时的“含糊范围”、或“未决地带”一定更会扩大。为此,也只有承认比较宽广的未决地带,理论与经验的结合研究才可能完成。”^③

但是,张教授在《通论》中从来也没有排除而是重视统计和数学在经济学科中的作用。全书有不少历史与现实的统计资料以及数学图表,并恰当地引用了霍夫曼统计经验法则在工业化程序与发展阶段的界限;此外又把自己对“工业化”的概念界定为一种函数,这都是很好的证明。

关于三结合的方法论问题,张教授在《分析方法再论》一节中,是这样加以总结的:“总的说来,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必须同时着重采用历史的分析方法,把理论的分析与历史的分析,以及与经验的或统计的分析结合起来。40年前我是这样看的,也是本书原版中试图这样做的,今天我仍然认为这样的看法和做法是正确的。”^④

二、新型发展经济学的提出及其意义

新型发展经济学的提出，最早是由张培刚教授于1988年10月在青岛一次学术报告中所提出来的。其后经过几年的探索与客观实践经验的丰富，把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范围、主要发展战略、和研究方法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体系。我们说这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里程碑，是发展经济学本身发展的第三阶段，是言之有理的，从发展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过程来看，最初是把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区别开来，从而形成传统意义的发展经济学。现在又把实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发展中的大国划分出来去专门加以研究。这些国家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的小国。其经济发展规律和发展战略，乃至国情、均具有不少困难条件与特殊因素，也可以说是属于“老、大、难”的国家，研究这类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构成新型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对象，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乃至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远不亚于四十多年前创建发展经济学的历史意义。我想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建立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持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

张培刚教授在《通论》的《总论》中（这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总论，全文约四万言，不仅总领《通论》的第一卷，也总领第二和第三卷），曾经正确地指出，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建立一是扩大研究范围，二是改进研究方法。关于研究方法问题，前面已略有述及，这里不再赘言。而对于研究范围的扩大与侧重点，则是新型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特色和发展。张教授指出：过去的发展经济学大都只研究第三世界中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而没有包括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雷诺兹甚至在《经济学的三个世界》一书中，把经济学划分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和欠发达经济。虽然他强调了欠发达经济的独立地位，但事实上还有实行计划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作者）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有各自不同的经济起飞与经济发展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相类似，有些问题则具有特殊性，而且一时尚难于解决，这样就大大丰富了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如果说把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包括在新型发展经济学中，是研究范围的扩大，那么对发展中的大国的研究则是新型发展经济学的重点与难点，或者说是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深入攻关的要害，而其中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又是发展的主题所在。张教授正是抓住重点、主题、范围、去构思其理论框架，进行以点（重点）带面（范围）、点面结合，并用从历史到现状的分析方法，去构筑其《通论》三大卷的宏伟编写计划的。

工业化尤其是农业国的工业化是新型发展经济学的主题，或者说是主要发展战略，是贯穿于《通论》三大卷的核心与线索。这一问题不仅是已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是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张教授在四十多年前就专门研究这一重大课题，从而为发展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过四十年以后，张教授还是认为“农业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带世界性问题……，特别是农业与工业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的问题，将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⑤

对于工业化定义，张教授是经过深思熟虑、独具匠心的，提出了具有独创和独见的概念。早在40多年前，他就写道：“工业化可以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⑥并且谦虚地说明这个定义是“试用性的。”经过40多年的历史检验，作者为了更

通俗化与进一步精确化,在《通论》中又重新表述为:“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⑦其中用“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去替代“生产函数”既是为了通俗化,也是为了精确化,书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工业化的这一定义,既避免了对“工业”的传统解释和与“产业革命”的雷同,而更重要的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实,即农业比重大和二元甚至多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以及生产要素组合优化率落后等情况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即工业化不仅包括一般制造工业、加工工业、而且包括并强调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这样一个既包括工业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的工业化概念,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才意识到工农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可见滞后于张教授的观点达40年之久。应该指出:张教授对工业化定义的重新表述,既能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又体现出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以点带面、逐步提高、由低级到高级的生产技术突破性变革的动态过程。我认为:《通论》中《分析方法再论》一节如果说能反映作者对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熟悉程度,那么《关于‘工业化’定义的重新表述及其说明》一节则较集中地反映作者对运用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熟练水平,我想这样的概括是恰如其分的。

和工业化相联系的是现代化。《通论》在工业化定义进行重新表述后,马上提出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联系的问题,这在逻辑上是顺理成章的,而且是读者所急于要求得到答案的问题。张教授对这个问题的论证,我认为是深刻并富有新意,因而是高人一筹、具有权威性的。张教授对比了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近年来所提出的“现代化”概念,并在他自己“工业化”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化”的具体含意。在此,我们感到奇怪而又令人钦佩的是,当今西方一些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对“现代化”的定义也是以张教授在40多年前哈佛版原版中的观点为基础的,不过说得更晦涩难懂而已!例如说现代化是指“无生命动力源泉对有生命动力源泉的比例的增长,已经达到或超过了不可回转的程度,”^⑧这类的用语有点类似于公元前亚里士多德的“有生命的工具”和“无生命的工具”了。其实,这样的概念,说穿了还是以张教授的“工业化”定义为主要基础和基本内容的。从这一点来看,如同发展经济学中其他重要观点一样,张教授是远远早于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这是历史的事实。

张教授在《通论》中明确指出“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密切联系,两者在涵义和内容上既有许多共同点,也有很多不同点。现代化的内容和范围更广泛,时间过程更久远。“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而“现代化”则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长河。此外,现代化还包含政治的、法律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革。在联系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时,张教授指出:“四个现代化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其中的关键又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⑨这一观点是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完全一致的。

三、发展中的大国是新型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对发展中的大国的研究,在《通论》中把它列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新型发展经济学“攻关”所必需的。其对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其中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大陆、印度、巴基斯坦、巴西、和埃及,这是典型的发展中的大国。因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详加论述,拟专题予以研究。

发展中的大国,除了具有一段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外,它们还有共同特点,在《在发展经济学通论》中把它们概括为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封建)历史悠久、社会情况复杂、人均收入

极低。对这类大国的研究,尤其需要采取历史的、比较的、分析方法,要找出其不发达的历史根源,对比发达国家的过去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在。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对发展中的大国的研究,如书中所指出的,更应该从社会经济的历史方面去进行多方面地考察。“更需要我们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探根溯源、寻找良策”。^⑩在这方面,张教授为我们树立了很好榜样和范例,他从历史的角度对比了中国与日本以及西欧发展商品经济的经验。同时,也点出了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至今仍然迟迟未能实现经济稳定起飞和高速协调发展,未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其阻碍因素何在呢?”^⑪

人口众多是发展中的大国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一个沉重的压力。因之尽管幅员广阔、地大物博,但“人均值”却很低,消费水平、经济增长都受到制约。全世界目前有总人口54亿,其中我国大陆就有11.43亿,印度近8亿,巴基斯坦有1亿多,巴西1.5亿,埃及约5千万,这五个大国的总人口占了世界总人口的40%以上,而且由于增长惯性居高不下,人口继续在增长。再加上文盲率高、人口素质差,就很难成为进行工业化与现代化的人力资本(资源)。“人多力量大”在过去的年代在一定条件下无疑是正确的,但在今天的科技时代,只有人才多才力量大,否则“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人口陷阱理论”就能得到验证。

至于这些大国的封建历史悠久,社会情况复杂也从另一侧面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大国都是文明古国、有着光辉灿烂过去,却没有繁荣昌盛的现在,并且先后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时间很长。至于社会情况复杂,就更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桎梏。为什么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不能为落后的大国所接受甚至被淹没?这些大国对于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先是闭关锁国,继之以盲目崇外,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以印度为例,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长达两个世纪之久,除了掠夺印度的财富之外,给印度带来的是灾难与“分而治之”的种种后遗症。此外,印度内部的政党、宗教、民族以及种姓与阶级的矛盾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几次尼赫鲁——甘地家族总理遇刺身亡,说明这种情况的复杂性,其中既有民族矛盾的因素,也有党派和宗教的矛盾渗透其中。但是它带来的后果是社会的动荡不安和经济停滞不前。马克思在对印度进行研究以后提出的“双重任务”理论,即先破坏旧制度,然后建立新制度,我认为正确的。

张培刚教授在《发展经济学通论》^⑫中曾经描述过一个他亲身经历过的故事,就是一条大牯牛不慎掉入泥潭中,后来通过同心协力、用牵、提、拉、抬的办法才把这条大牯牛挣脱出来。我想我们这些发展中的大国,也类似这条陷于泥潭中的大牯牛,同样必须用牵、提、拉、抬的办法,同心协力,综合治理,把这条大牯牛从泥潭中解脱出来,重新走上康庄大道,奋蹄向前。

注释

①②⑩⑪⑫《发展经济学通论》第1卷,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总论第23、21、7—8、23、48—49页。

③④⑥⑦⑧⑨《发展经济学通论》第1卷,第383、44、140、190、196、199页。

⑥《发展经济学通论》第1卷,中文本初版,自序第1页。

(责任编辑 曾德国)